

阡苑有书

# 一直在变化的北京

■星河

【在今天的北京，古老建筑与摩天大厦比肩而立，大栅栏、琉璃厂与金融街、中关村交相辉映，传统的风筝与现代的航模在同一片天空飞舞……】

曾经有人问我：你爱喝豆汁吗？我说喝过，但并不爱。对方十分奇怪：你一个北京人怎么不爱喝豆汁呢？的确，很多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人，喜欢豆汁之类的传统饮食，似乎豆汁已成为一个符号而非一种饮食，代表着北京的一部分。但其实，北京一直在变化，北京人也一直在变化，方方面面，林林总总，包括但不限于饮食。

不错，一提到北京，浮现在大家脑海中的就是六朝古都，就是紫禁城，就是胡同，就是大栅栏和琉璃厂，就是烤鸭与涮羊肉……宛如一大堆被固化已久的经典符号。这些都错了。但这早已不再是今日北京的全部了。要知道北京每年每月都在变化，而在如今这样一个发展迅猛的时代，更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

回到开始的餐饮方面。北京确实有很多令人百吃不厌的经典小吃，不生在北京或者不常年生活在北京的人难以体会到这些美味的感觉，这恐怕也算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但北京的饮食系统，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川菜湘菜粤菜鲁菜……全国各大菜系，几乎所有分支，都能在北京地面上找到。北京以其博大的胸怀，囊括包容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口味。

但在包容的同时，北京也在潜移默化地做着改变。仅举两个例子。

煎饼果子，本来真是“煎饼”与“果子（油条）”的结合体；这种小吃初入北京时，用的真是“果子”，后来却慢慢改良成为口感更好的“薄脆”；及至增加黑豆面品种，加入生菜，以及鸡柳火腿培根带鱼云云，更是五花八门，不胜枚举——你可以认为这早已不再是真正原始的煎饼果子，但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具有建设性的改良尝试。

早年进京的新疆烤羊肉串，原本没有那么多花样，至少烤板筋是没有的；但在北京，这种看似无用的食材却在烧烤摊上有了发光发热的余地。

北京在改变外来食品的同时，也在悄悄地改变着自己原有的饮食方式，包括食材和制作方法。同样是两个例子——

北京的烤鸭原来都是炉烤的，此前逐渐开始改为电烤，当然在技术上也作了一定的处理，但至少普通食客是吃不出差别的。

同样的，涮羊肉的火锅也在从炭锅向更加安全干净的电锅转变——假如非要说是挂炉烤鸭特有的果木香味无法被电烤前涂刷的果汁调料所取代，那么认为电锅伤害了炭锅的固有味道那就实在是没有什么根据了。

至于来自国外的食品引进，那就更无须赘述了。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北京引进了诸多的西式餐饮，而这些异域风味同样也在改变着北京的饮食特色。别的不说，单是老字号稻香村的点心，就早已加入了黄油，而这完全来自西点的模式。

除了餐饮，历史悠久的著名建筑似乎也是北京的经典形象。其实说起北京的建筑，并不仅仅是富丽堂皇的宫殿与青砖灰瓦的四合院，虽说宫殿确系皇族王朝的象征，而胡同也确曾是北京平民阶层的居所。在历史上，紫禁城的宫殿、北海的白塔以及八达岭的长城都曾作为北京的特征符号，胡同的拆迁也屡屡遭到诟病，但这些建筑遗迹绝非现代化北京建筑格局的全部。

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建起了许多新型建筑，从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到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以及北京站等等，都采取了一种中西合璧的建筑形式。而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一座座新建筑更是拔地而起，从代表着世纪交替的中华世纪坛到形象特立独行的国家大剧院和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再到奥运场地的“鸟巢”（国家体育场）与“水立方”（国家游泳中心），所有这些，都代表着真正的现代建筑理念，构成了新北京的新地标。

如果说建筑只代表着一座城市的静态形式，那么出行就意味着一座城市的动态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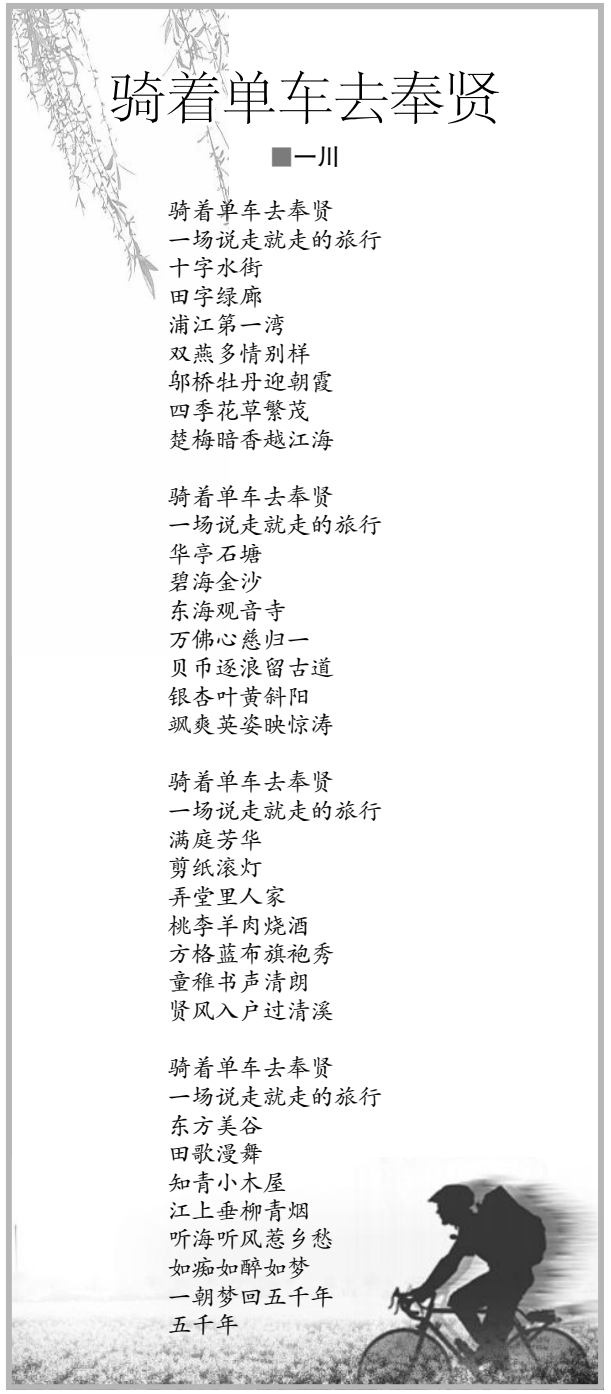
也许你读过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对于人力车夫的冷暖辛酸有着深刻的印象，不过这种交通方式早已成历史陈迹。当然，如今在北京街头，“人力车夫”的形象依旧存在，但早已变为一种特别的旅游项目，而且车夫的操作

方式也已是“蹬踏”而非“徒步”。

同样消失的还有有轨电车，这种在北京存在了半个世纪的交通工具，进化成了无轨电车。要说现在的出行方式，真可谓琳琅满目：有私家车，有公交车，有出租车，还有密如毛细血管的城市轨道交通，如果再加上自行车和徒步，可供选择的方式实在太多太多。当然，大城市的交通拥堵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现代都市生活让人头疼的一个不利侧面。

真要讨论起来，诸多领域和无数例证实在是数不胜数。放眼望去，事实上今天的北京早已不再是昔日的皇城帝都，而是新时代背景下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今天的北京，古老建筑与摩天大厦比肩而立，大栅栏、琉璃厂与金融街、中关村交相辉映，传统的风筝与现代的航模在同一片天空飞舞……

总之，今天的北京已非经典与传统意义的北京。今天的北京，是变化中的北京；今天的北京，是动态的北京；今天的北京，是面向未来的北京。



## 关于文学家传记

■潘小松

【即便是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那样严谨而持之有故的回忆录，我也情愿当它文学作品来读。】

文学家传记有很多内容大抵不可靠。是因为文学家成名之前个人履历缺少正式记录所致；同时也因为个人隐私让文学家在传记面前三缄其口；更因为作品的纪实与传记的虚构混淆视听。

文学家生活的不规律加上生活记录的随意使读者很难一窥文学家的准确生平。自传和他传都大抵依赖日后的回忆和访谈。记忆的模糊和岁月的久远决定回忆录式的自传和采访所得的传记都不十分可靠。

在它们这片土地上，文学家是有榜样作用的。出于各种考虑，文学家的传记在行文的主笔下对瑕疵有近乎本能的剔除过程。如果是主流肯定的榜样文学家，传记就高大上到不食人间烟火了。比如鲁迅的各种传记。这种意识甚至影响到对外国文学家的介绍。我迄今脑子里的拜伦和雪莱就是革命诗人的形象。

有个人隐私意识的作家至少生前不愿意别人介入他的私人生活领域。这是了解文学家生平的另一个障碍。我阅读文学家传记的时候，遇到难解，往往情愿自行揣测判断，也不愿相信作者的搪塞。文学家自己则有甚至认为个人履历与作品好不相关者，比如海明威。假如不为了

“科学”研究，我也认为读者可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来体会作品，不必劳烦作家。文学的索隐式解读是窥探文学家生平的根子，于满足好奇心有益，于欣赏文学无涉。因为自己和文学家以外的他人的阅历同样是解读作品的钥匙。正如患者不必追问医生的病历。不知这比方恰当否。

聪明的作家是把传记的成分融入作品的。比如《红楼梦》，读者就很难分清虚实。比如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比如汪曾祺的小说。作品加入传记成分至少让读者窥探到作家的阅历深浅。用文学作品表达自己的看法并记录人生体验，既可避免隐私诸于众，也可借人物的一陈对万事的真实见解。我读过几种海明威的传，也读过他的大量书信；我挺愿相信海明威的小说是自传。

我对各种传记的兴趣是在四十年的阅读经历里培养的。我情愿相信好的传记作品属于文学而非历史。即便是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那样严谨而持之有故的回忆录，我也情愿当它文学作品来读。因为，曹的回忆录所述的对象属于他个人偏见的结果。伍尔夫所谓 prejudiced reader。《我与我的世界》之所以好看耐读，端赖这种“偏见”。我们所谓“有个性”即此。

一部回忆录假如有足够的文采和学识，它的文学价值等同于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比如夏多布里昂的《墓畔回忆》，比如朱可夫元帅的《回忆与思考》，比如巴金翻译的那部《往事与随想》。

我们追求久远的文学梦幻是为了给心灵提供滋养。正如久居被电信诈骗的都市后回到永嘉南溪江的田园风光。吉光片羽于字里行间就像在野地里发现久违了的野草莓。那喜悦说是回味，是记忆，是芳香。文学阅读之不同于其他就在于此了。

## 物质与精神统一起来的事业

■武夷山

【小学6年级孩子参加学习园的园艺活动后，平均每天的果蔬摄入量比过去增加了2.5次。】

Kimbal Musk(金博尔·马斯克)的事业，将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统一了起来。马斯克1972年出生于南非，是著名的企业家、风险投资家和环保主义者。2015年，他的资产净值达25亿美元。他是做食品的，但不是简单的食品生意。他母亲是膳食学家，父亲是工程师。他在南非比勒陀利亚读完高中后，去加拿大女王大学读商科。读书期间，他在加拿大丰业银行打工过。他毕业后创办的第一个公司是做家居粉刷业务的，第二个公司是与哥哥埃龙·马斯克(特斯拉汽车公司创办人)一起创办的，叫Zip2，是做电子黄页的。1999年，该公司出售给康柏公司，售价3.07亿美元。出售Zip2后，马斯克有了一大笔钱，他就投资多个软件公司和技术公司。

再后来，他到纽约著名的法式烹调学院就读。毕业后，2004年4月，他与朋友在博尔德市一起创立了“博尔德厨房”，属于社区餐厅。该餐厅曾入选为“美国顶级餐馆”之列。然后，他们的生意在各地不断扩张，但“厨房”这个词时常出现在他们开办的新餐馆的名称里。“厨房”就是他打造的招牌。

科罗拉多州有一家基金会叫“Growe Foundation”，其使命是教育孩子如何健康饮食和保护环境，具体项目之一是在博尔德市各个

社区建设校园蔬菜园。既然蔬菜园与饮食相关，马斯克从开餐馆起就慷慨斥资支持该基金会，支持了七年之久。七年后的2011年，他与朋友决定自己成立一个非营利机构叫“厨房社区”，其使命是在全美各地建设“学习园”（学习园往往建在学校的操场上，而不是在不起眼的犄角巷里），让孩子们通过相关课程和活动，亲自感受到每日三餐的食物是怎么种出来的，健康饮食是什么样，如何选择良好的生活方式，如何保护环境，等等。学习园的活动与校方的数学、科学等课程是密切配合的。

他规定，“厨房”系列的每家餐馆都要将其营业额的一定百分比捐赠出来，帮助当地社区建设学习园。2012年时，厨房社区已经在科罗拉多州建设了26家学习园，在芝加哥市建设了16家，在美国其余地方还有12家。

现在，很多孩子都不爱吃蔬菜。不过，亲手种植之后，孩子们对蔬菜的感情就发生了很大变化。一项研究表明，小学6年级孩子参加学习园的园艺活动后，平均每天的果蔬摄入量比过去增加了2.5次。而且，孩子们参加学习园活动后，学习成绩也有所提高。因此，学习园受到越来越多家长和政府当局的欢迎。

2012年12月，芝加哥市长Rahm Emanuel决定，向厨房社区提供100万美元，让他们在当地的中小学里再建80家学习园。2015年2月，厨房社区在洛杉矶市的一所小学建立了学习园，至此，他们在全美国建立的学习园达到了200家。到2015年底，学习园总数达到260家。

## 但愿它是一只吉祥鸟

■郑千里

【“刚才才是刚才。你贴了这么多的邮票，我连盖邮戳的地方都没有，能不超重？再补一元钱邮票吧！”营业员毫不客气。】

事情发生在1987年。我到邮局给侨居在新加坡的一位前辈乡贤写信，电子称上显示出邮资金额后，我看到柜台出售面额为八分的《国际住房年》纪念邮票，欣喜地倾囊中所有尽数买下，在信封背面满满当地贴了十几张，外加一张四分钱的普通邮票《北京民居》。

欣喜之余，竟没太注意到女营业员的问话：“你不买高面值的邮票吗？”

难怪我飘飘然。我业余集邮，也收藏有为数不多的邮票珍品，但我爱这枚《国际住房年》胜过了其

他。因为我当时的住房既没有《北京民居》中小四合院的幽静古朴，也没有《国际住房年》邮票设计的那样典雅秀丽。

我的住房简陋而拥挤。只有十来平米的居室搭了两张床，我和妻儿三人在书桌上看书写字，经常是鼻尖顶着鼻尖。当然，“诗意”也未尝没有，“三面环水一面山”，北窗窗根一方水池可防止窃贼破窗而入，东西隔壁有水管滴漏权当古钟报时，门外楼道里书篋山一样堆叠矗立，妙相庄严。

故此，我对《国际住房年》邮票分外喜爱。成语有“爱屋及乌”之说，我爱屋，羨屋，细细观赏，这枚邮票上印有一只绕着屋顶飞翔的鸟儿，我想，它应该是一只喜鹊吧！中国人向来酷爱喜鹊，讨厌乌鸦。

我在信筒上贴足了邮票，递给女营业员检验，她像刚才没见到我的举动似的，叫了起来：“不行，信已经超重了！”

## 六进灾区

■李鸣生

【但我心里始终横亘着一个问号：灾区百姓能从血迹斑斑的废墟上爬起来吗？】

“5·12”汶川大地震爆发后，我先后六进灾区走访。第一次是2008年5月19日，耗时十天，总行程三千多公里；第二次是5月30日，耗时十二天，总行程两千多公里；第三次是7月1日，耗时半月，总行程两千多公里。

结束三次走访后，我完成了国内第一部长篇摄影报告文学《震中在人心》的写作。但我心里始终横亘着一个问号：灾区百姓能从血迹斑斑的废墟上爬起来吗？于是2009年5月12日我又第四次走进灾区，走访的重点是北川。此时的北川和一年前虽大有不同，但废墟尚存噩梦依旧，从绝望中爬起来北川灾民的眼里，依然残留着困惑和迷茫。有一天，我在北川老城的废墟上，遇见一位12岁的小女孩。小女孩双膝跪在废墟上，目光呆滞，满脸忧郁，正默默地为遇难的父亲烧着纸钱。我问小女孩，你现在最发愁的是什么？小女孩告诉我，自从爸爸去世后，妈妈就病倒在在了板房上，一直卧不起。她现在最发愁的，就是家里要重新盖房子，还差好几万块钱！她很想到成都或者深圳去打工，挣点钱回来，早点为妈妈再盖一间小房子。这位小女孩的话，像针一下刺痛了我的心：地震后的灾区百姓，真的全都站起来了么？站起来的灾区百姓，又真的能冷静面对过去，坦然面对未来么？

带着这样的疑问，2010年11月21日，我又第五次走进灾区。此次走访，耗时22天，总行程约四千多公里。此次走访的重点是成都市所属的都江堰市、崇州市、彭州市、大邑县四个重灾市县。尽管来之前我已得知，灾区人民不仅从废墟上站了起来，而且还搬进了漂亮的小区，住进了高档楼房，日子过得舒服安逸，有滋有味。但我还是心存疑虑，因为当今许多事情常常让你真假难辨，是非不清。所以我对某些报道很难信以为真。但随着走访的深入，我的疑虑逐渐消失。我先后跑了数十个城镇、乡村，学校和灾后安置点，对数十个镇长、书记、村支书等逐一做了走访。一路走来，我在曾经见证过尸体与坟坑，残壁与破房、污污与泪水、新生与死亡，既没有听见悲伤的哭泣，绝望的叫喊，

我惶恐道：“你刚才不是说贴一元四角就够了吗？”

“刚才才是刚才。你贴了这么多的邮票，我连盖邮戳的地方都没有，能不超重？再补一元钱邮票吧！”营业员毫不客气。

一丝苦笑凝在了我的嘴角。哦，邮票本身是有重量的，粘上的浆糊是有重量的。为这十几枚的《国际住房年》，我还得贴邮票。苦笑中，我似乎得到了点启悟：营业员何以如此慷慨地给我这么多的“住房”？明知我犯了超标抢占“住房”的错误，却熟视无睹，不予制止，是何心理？料想她家的“住房”也不会过于宽敞吧？

我联想到，过去我国实行公职人员低租金、高补贴的住房分配政策，一平方米的住房面积差不多相当于八分钱一张邮票的价格，长期这样的结果，使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建国后的30多年时间里，虽然兴建住宅的财政总投资达到1700多亿元，但是住房越建越多，越来越好，且不说“锦上添花”者“不领狼情”，大言不惭地说：“我是交了房租的！”而期待“雪里送炭”者，更是气得“跺脚骂娘”，愤愤不平：“凭什么给他们分房子，却没有我们的份！”

为了减轻，我只得剪开信封的边缘，取出夹寄里头的一张画片。幸甚，它和十几张《国际住房年》的邮票重量相等。

表叔说，新加坡的前辈乡贤当年秋天将回国访问，届时可在我北京的家里小聚。这使我惶恐了好几天。前辈乡贤与巴金、冰心、刘海粟等文化名人交往甚笃，若光临“三面环水一面山”的寒舍，连一张让他落座的沙发都没有，岂不是大寒惨，有失颜面？

但前辈乡贤知道祖国的国情。他多次回故乡福建探亲，看到城镇居民住宅虽然互相挤轧，难以喘息透气，但乡间农家的楼房则突兀而起，雄踞于木兰溪畔和湄洲湾；他应邀去山东访问，眼见齐鲁大地虽然有一块块补丁缀钉似的土墙茅屋，但曲阜日新月异的建设，已远非当年孔府的钟鸣鼎食可比；“蓬莱新八仙”展示的改革开放宏图，更比海市蜃楼更令人叹为观止……

乡贤是新加坡作家协会名誉会长，他为自己的居家取名为“映华楼”，写的散文、出的文集，都以此落款，可见对祖国血脉所系，一往情深。他不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也不会因我这简陋的住室，就此推翻对祖国建设成就的认可。

想到此我也就释然。值得欣慰的是，就在1987年8月，作为试点的山东省烟台市，在全国率先推出改革城镇住房制度的试行方案。“安得广厦千万间”，成为全国亿万城镇居民关注的焦点。

1982年，第3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1987年为“安置无家可归者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Shelter for the Homeless)，简称“国际住房年”。1987年8月20日，为宣传国际住房年的意义，我国发行了《国际住房年》纪念邮票。

邮票的面值八分，这意味着，大部分的人们将用它邮寄平信。我凝望着邮票画面上的飞鸟，虽然说不上它的名称，但愿它是一只吉祥鸟，能够带着殷切的期盼和祝愿，飞入寻常百姓家。贴满“吉祥鸟”，我放心地把这一国际信函投进了邮筒。

距今我写这篇文章，已是近三十年过去，不知《国际住房年》邮票现在市场价格几何？近三十年来，《国际住房年》邮票的涨幅大，还是商品房的涨幅大？现如今，人们已基本不寄送传统意义上的信件，也就无需邮票，邮票已在很大程度上淡出百姓的视野。但住房直接维系民生，却不能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

（选自《后地震时代》，李鸣生著，中译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